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新语词

XIN YUCI

陈原著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XIN YUCI

新语词

陈 原 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目 录

“二恶英”	(1)
新的语词	(3)
新语词产生的源泉	(6)
当植物人醒来的时候	(8)
当社会沉睡的时候	(9)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12)
“打的”	(13)
“超级市场”	(15)
“网”和 VCD	(17)
导入新语词的途径	(19)
旧词新义	(19)
从方言导入的新语词	(21)
造新词	(23)
外来词(借词)	(24)
压缩而成的新语词	(27)
新语词的出现是不可抗拒的	(30)
新语词丰富了我们的语汇库	(31)
新语词的“法则”	(31)
新语词不完全是流行语	(33)
新语词的创造与规范化	(34)

“二恶英”

巴尔干战火刚刚要熄灭时，报纸上忽然出现一个新语词“二恶英”，它震撼了全世界，也震撼了我们中国。有人念作 èr - è - yīng，有念作 èr - wù - yīng，电台或电视台的播音员读法也不全一致，因为汉字“恶”是个多音字，可以念 è（“恶人先告状”的“恶”）也可以念作 wù（“深恶痛绝”的“恶”）。

1999 年 6 月，先是比利时一些小学生喝了某厂生产的可口可乐，发生中毒现象，接着卫生部门查出家禽例如肉类和奶类产品都含有一种剧毒化学品，某厂生产的可口可乐之所以出事，也是因为含有这种剧毒化学品。

这种剧毒品就是全世界报刊上出现的新语词“二恶英”。

初步查明，这是比利时一家饲料公司供应的饲料含有这种化合物引起的，这家公司的饲料供应的范围包括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由此这四个国家紧急下令查封今年 1 月 16 日以后生产的肉类奶类，产品一律收回销毁。接着惊动了全球，因为西欧四国的产品行销五大洲，一时人心惶惶，我国有关部门也作出紧急反应，封存产品，调整进口。

于是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二恶英袭击人类的事件。

“二恶英”，“二恶英”，好陌生的东西。这是什么怪物呀？

三个汉字怪模怪样，像有某种意思，又好像随意组合，没有什么可恶的意思。

原来它是一个进口的新语词：英语作 dioxin. 读音作 dai - ok - sin,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o -)。

这个新语词的汉字组合，暗示这个东西有点可恶的样子，其实“二”是 di 的意译，“恶英”则是 oxin 的音译。引进一个西文语词，半个从意译，半个从音译，这种造词法也是现代汉语所常用的。

去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没有收这个语词，这不足为怪，这本来是一个很专门的化学名词，虽然美国飞机在侵越战争中曾把含着二恶英的药剂飞洒在这片土地上，企图使这里寸草不生，不过那时媒体没有着重宣传，我们也就没有印象罢了。

但是去年出版的《新牛津英语字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1998) 520 页却收有此字。看来这里的释义，是近年英美出版中型同类词典中比较确切详尽的一种。

据它的释义，二恶英是一种剧毒化合物，是某种工业生产过程(例如除草剂或造纸漂白)中的副产品，它严重污染环境。释义还给出了它的别名，那是一连串字母组成的，教人看了头痛的化学名词：

tetrachlorodibenzoparadioxin

它同时给出了此物的化学构造式,这里就略去不谈了。

幸好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也收有此字,中文释义为

【化】二氧(杂)岂

可惜我们从这里只能知道这是一种化学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就茫然了。如果它能注上“剧毒化合物”该多好,不过这已是过于苛刻的要求了。

一个新语词就这样突然出现——也许过不了多久,事件过去了,这个语词又重新躲回词典中它的藏身之处。

新的语词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新的语词。

新语词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

当社会生活出现新的事物,新的概念,新的思维,而使用原来的语汇,不能确切表达这些新事物,新概念,新思维时,人们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创造一些新语词,或者干脆从别的语言那里借用现成的语词。

例如八十年代以前,谁也想不到会出现“一国两制”这样的语词,因为过去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没有这个概念。我们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而不曾发明一国可以实行两种政

治制度的理论。

经济生活中也出现新语词,比方在改革开放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商场可以这样任由顾客自由自在地挑选商品的买卖方式,当“超级市场”这样的新事物引进后,于是使用了翻译过来的新语词:超级市场。最初一个阶段,有些城市面对这新兴的事物,觉得“超级市场”为什么要叫“超级”,听起来不那么习惯,便把这新事物称为“自选市场”,似乎好懂多了。可是经过一个时期,人们还是选择了直接翻译过来的“超级市场”这个新语词,而舍弃了好像很中国化的“自选市场”。

“超级市场”也好,“自选市场”也好,都是为了称呼原先不曾有过的新事物,它们都是新语词,可是一个被淘汰了,一个却活下来了。近来人们嫌它四个音节太长,往往简称“超市”——现在“超级市场”跟“超市”这两个新语词平行地使用着。

在首都生活的人们,近年发现“埋单”“的士”(派生出“打的”),“搞掂”之类的新语词不绝于耳,这许多从南方传来的方言语词,也在流行着:这些不是科学技术术语,而是日常生活用语。

任何社会,只要它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只要它还在不断地进展,就必然会经常出现新的语词。

任何一种活着的语言,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口头语)或文字(书面语),遇到原来的语词不能

表达新义的时候，必然会造出新的语词。谁也没有力量阻挡新语词的出现；谁也没有能力或权力阻止或禁压新的语词。个人固然不能，机关也不能，甚至权威机关也不能。

必须知道，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它在运行中已形成一种社会习惯，而社会习惯是根深蒂固和非常顽强的东西，约定俗成之所以值得重视，就是因为这一点理由。

过去人们不太注意新语词，也很少研究新语词，也许这是因为从前社会变化的速度比较慢，科技发展也不那么快，所以新语词的出现不那么频繁，更不那么显眼。

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所谓信息爆炸，是极言其多，极言其快。在西方世界，人们常说知识更新的周期大约只有五年左右，这就是说，仅仅过了五年，很多知识就老化了，如果不进行知识更新就会落后了。而在过去的世纪，几十年几百年才更新一次。

用语言学家的行话说：社会语境变化得很快。既然社会上天天出现新事物，新概念，没有新的语词，就不能准确表达这些新出现的东西。所以语言学家，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家，时刻注视着新语词的出现，把它们收集起来，分类排比，加以分析，提出规劝性的意见——说，这个新语词很好，

那个不怎样好,另外某一个不太符合语言习惯——让学习语言文字的人,教人学习语言文字的人,以写作为业的人(例如记者,作家,文书,编辑等等)加以注意。当然,如上面说过的,这只是规劝,不是命令,而且谁也不能下有效的命令。

新语词产生的源泉

产生新语词的源泉,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生活的变动,一个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也许社会生活的变化不那么显眼,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带来的新事物,创造的新概念,却是容易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比方说,九十年代成功地发展了国际互联网,就不能不产生一连串的新语词:

互联网,内联网,外联网,因特网,
还派生出

网民,网虫,网址,网页,主页,黑客,
接着产生的网上行为,例如

网上书店,电子邮件(e-mail,戏称伊妹儿),
还有因发展网络而天天叨念着的计算机部件或有关新语词,如

硬件,软件,光盘,光驱(光盘驱动器),
鼠标,芯片,多媒体
以及一个十分拗口的新语词

调制解调器。

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这许许多多新语词,连小学生也能脱口而出了。

至于产生新语词的另外一个源泉就是社会生活。这里包容的范围极为广阔,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生产,生活,无所不有。由此产生的新语词,比比皆是,不过有时察觉不到它们是新的罢了。从这个源泉流出来的新语词,人们天天不断地使用着,不过感觉与前一个源泉不同,仿佛这些语词自古已经存在,不觉得它们是什么创新,其实却是刚刚创造出来或从别处“拿来”的新语词。比如说“国有企业”,“下岗”,看上去好像“国营企业”和“上岗”一样,一点也不刺激,好像没有什么新意,心里就不把它当作新语词了。

再举一个例。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蛮横无理地对一个主权国家南联盟狂轰滥炸,其间竟然轰炸我驻南使馆。美国北约使用了新的战斗武器:

隐形飞机 石墨炸弹 集束炸弹

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新语词。连“北约”一词曾经是新语词,不过现在已经不新了。

由此可见,只要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天不停止,只要社会生活的发展一天不停止,新事物新概念新思维就会出现;只要这个社会的群体使用的语言有着

强大的生命力，表达这些新事物新概念新思维的新语词就一定会不断涌现。

当植物人醒来的时候

听说有植物人沉睡了好多年，忽然有朝一日醒过来了的病例。

假如真有那么一个植物人，从六十年代开始，他就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无知无觉地度过二三十年。到九十年代初，他醒过来了。他会说话了，当然他已经恢复知觉，能够思想了，他甚至康复到一个正常人的水平。

这个人此时一定很痛苦，因为他跟别人对话时，听不懂别人的许多话语；他自己呢，当然满口都是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所惯用的语词。他觉得别人说的都是他所不能确切知道语义的新语词，似懂非懂，实际上是不懂。这些新语词出现的时候，他这个人正在沉睡中，他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个新语词产生时的语境，他不可能知道这些个新语词的真正涵义。他确实痛苦极了。

这自然是我杜撰出来的一个虚幻的故事。沉睡了二三十年的植物人，可能不会再醒过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却亲身经历过类似的情景。

1978年，我住在医院里，碰巧被“四人帮”陷害的所谓“三家村”一分子的廖沫沙，也被安排到这个

医院治病。他在监狱和流放地渡过十多年岁月。他被剥夺了与世接触的权利。我们是老相识了，有一天他忽然悄悄地问我：“什么叫做深挖五一六？”他既不知“五一六”为何物，也不知这个东西为何要“深挖”。真有点像陶渊明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样子。——说也可笑，“五一六”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虚构的，是“四人帮”捏造出来的一个所谓秘密反革命组织，其实是借此发动乱整革命人民的政治运动。廖沫沙被隔离多年，他自然免受“深挖”之苦，当然他就不明白这两个语词的语义；这两个语词对他来说，是新语词，而在别人则已经不是新的语词了。

当社会沉睡的时候

社会跟个人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一样的。

当一个社会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根本或很少跟外间世界接触，它自然不能理解外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外间世界时刻在变动着，出现了许许多多新事物和新概念，这些对那个封闭的社会完全是陌生的，这个社会陷入一种类似沉睡的状态。其时，这个封闭社会的成员一旦接触到外间世界，他们当然不能了解，更不能理解所看到所听到的一切。

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的社会，自身的发展也一定是很慢很慢的，这就是我们的成语里说的“固

步自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新语词的产生是很少的,因为社会生活凝固了,停滞了,也就是说社会昏睡了,沉睡了。在这样的语境下,社会思想常常会导致恐外病和自大狂。试举一例。二次大战后,苏联接触外间世界才比较多,但一听到“控制论”就发了慌,斥之为“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伪科学”——思想僵化的御用学人,不肯认真去探究“控制论”这个新术语的涵义,当然也不去探究这门新科学的实际内容,只是一个劲儿地叫嚣“伪科学”,现在看来,多么的可笑啊。

然而在现今的条件下,一个现代社会,一个现代国家,绝对不跟外间世界接触是不可能的,桃花源只不过是古代文人笔下的想像中的图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所以实行自我封闭政策,是很可笑的,归根到底还是害了自己。试想想看,当我们的善良的人民,包括很多有教养的有识之士在内,还在沉湎于或半信半疑地对待稻田亩产十万斤那样的空欢喜场面时,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已经在海峡那边的大学里作语言学演讲,大谈什么比特,什么熵,什么信息论,什么控制论,什么电脑,什么计算机了——不消说,所有他说的这些语词,在那个时候,我们这里只有很少人知道它的语义。

不过即使是封闭型的社会,也能产生新语词,除

非这个封闭社会完全停滞了，除非连这里所用的语言也完全失去了生命力——而那样的语境是不能存在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生产停滞了，社会生活除了虚拟的阶级斗争以外，可以说也静止不动了，即使在那样半封闭的语境下，不是也产生了一些后来不用、并且令后人费解的新语词么？“走资派”（它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缩略语）一词的出现，便是一例。虽然它的出现是在十年浩劫的前夜，但却泛滥于那十年中，是特定时期封闭或半封闭社会极左思潮的产物——在那个特定时候，它确实是新语词，只不过它一出现就带着含混不清的语义，而且是谁也说不明白它的准确语义。随着时光的推移，“四人帮”覆灭了，改革开放时期开始了，极左思潮已经不是社会意识的主流，这个曾经“新”过的语词，已失去存在的条件，自然从现代汉语的通用语词库中消失了。它已经不是新语词，而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语言残迹了。

这就引出一个新问题：在封闭或半封闭的社会环境里出现的新语词，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也许已经不是新语词了，已经进入最普通的语词库了。八十年代的开放，给我们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图景，好多新事物新概念让我们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于是在语言应用上发生了一些现在听来很可笑的“误解”，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些人分不清

“录音机”和“窃听器”，telex(电传)和“电报挂号”的分别，更不知什么叫做 FAX——聪明人把它翻译成“图文传真”。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假如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个植物人，在 1984 年 4 月 27 日苏醒，他打开电视，听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这样一个词组，他完全不知道他听见的是什么东西。

不过那一天，就算不是刚刚苏醒过来的植物人，听到电视里说的这一连串字眼，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因为这种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病也许是那一天在美国命名后初次通过传媒公布的。我们电视台用现代汉语播发的这个病名，是从英语直译过来的，准确无误：

获得性 = acquired

免疫 = immune

缺陷 = deficiency

综合症 = syndrome

第三天(1984.04.29)新华社播发文字稿时，用了下面的词组，

后天 免疫力 缺乏 综合症

啊，原来如此，这比早两天出现的词组好懂多了。原来医学上所谓获得性，就是说不是先天的，即是“后

天的”；“免疫缺陷”换成“免疫力缺乏”也教人听起来明白多了。不过千万不要责怪第一个译者，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一下子谁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呀；可是新闻却等着要播发，怎么办？只能照字面译出，而这译法绝对没有走样。

不久，这个词组在说英语的人看来也太啰嗦，他们把四个单字的头一个字母抽出来，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单字

AIDS

这是英语的一种构词法(造字法)——其实所有拼音文字都可以使用这种造字法——这样一来，容易上口了，于是这个缩略语很快流行开了。香港把这个压缩的新字译作

爱滋病

简单明了，一下子就通行了。我们的传媒也移植过来。后来我们这里有人不喜欢“爱”字，于是爱滋病就成了

艾滋病

现在这个称呼在大陆定型了。

由此可以约略看见新词语从出现到定型的一个过程。

“打的”

还是上面说过的那位植物人，当他苏醒过来的

时候,他当然也不懂什么“打的”——他更不知道这个新语词是动词还是名词,因为他昏睡时,出租汽车很少很少,那时称作“出租车”,有的地方又叫做“计程车”。改革开放以后,城市交通大大的变样了,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出租车,人们起用了一个音译的新语词:的士。这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借用了香港粤语(广州方言)的口头语,即英语 taxi 的音译,来称呼出租车。

那么,的士为什么要“打”呢?我以为是从广州而不是从香港来的。香港人从不说“打的”。据我推断,八十年代初,北方人到广州乘坐出租车时,口称“搭的士”——那时广州是最先拥有较多出租车的城市——广州人一听,以为说的是“打”的士(普通话“搭”和“打”都念 da),于是报刊上的书面语就写成“打的士”。由“打的士”简化而成“打的”,传到了北方,传开了,流行了,约定俗成了,现在几乎到处都把乘坐计程车这种动作叫做“打的”。难怪那位植物人醒过来时,无法了解“打的”是一种新的东西还是一种什么动作了。

“打的”这个新语词在首都流行了好多年,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街头出现了很多黄色甲虫似的小型出租车,实际上就是平常所说的小型客货两用车,人们称之为“面的”。“面的”的“面”,就是“面包车”,“的”即“的士”(出租车)。如果说“的士”这个名称是